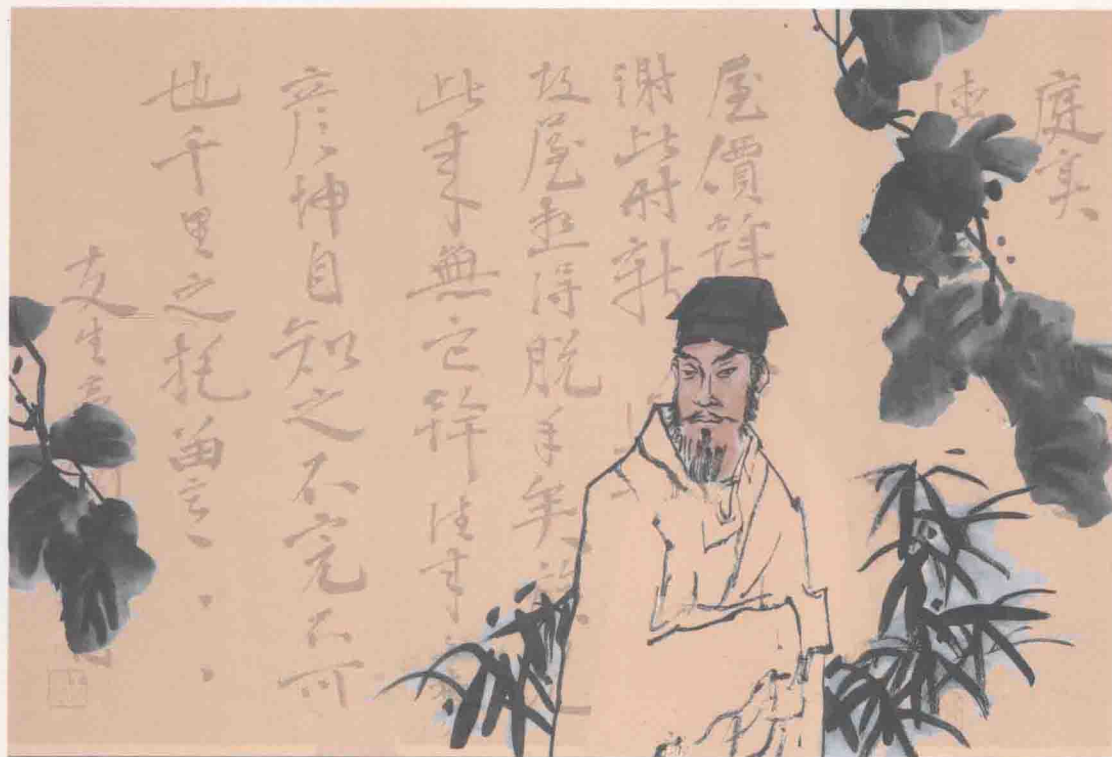




华夏文明之源

绚丽甘肃
GLORIOUS GANSU

河陇人物



LI MENG YANG

李梦阳

郝润华 吴 娱 /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华夏文明之源

| 河 | 陇 | 人 | 物 |

LIMENGYANG

李梦阳

郝润华 吴 娱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梦阳 / 郝润华, 吴娱著.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4. 5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423-3184-7

I. ①李… II. ①郝… ②吴… III. ①李梦阳(1473~1530)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0176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吴洁琼

美术编辑: 马吉庆

李梦阳

郝润华 吴 娱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056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170 千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23-3184-7 定价: 3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华夏文明之源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连 辑

副 主 任：张建昌 吉西平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强 王正茂 王光辉

刘铁巍 张先堂 张克非

张 兵 李树军 杨秀清

赵 鹏 彭长城 雷恩海

策 划：马永强 王正茂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相

传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4000—5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彩陶文化，以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了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

廊地区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和永靖恐龙足印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教名山”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标志——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座”。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 and 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出版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世人。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先周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边关

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简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星座”。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前言

在文学史上，李梦阳是明代中叶盛行一时的重要文学流派——“前七子”的领袖，他笔力千钧、气势雄豪的文风为古代文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李梦阳也是受到訾议较多的文学家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空同集》提要批评他“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厥后摹拟剽贼，日就窠臼。论者追原本始，归狱梦阳，其受诟厉亦最深”。故而，文学史上的李梦阳曾经是一个令众人仰目而视的功臣，又好像是一个将文风导入模拟剽窃之途的罪人。他的功过是非，令后来的学者议论纷纷，他也因此而成为明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焦点人物。

李梦阳（1473—1530年）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一称崆峒）山人，庆阳（今甘肃省庆城县）人。李梦阳在《空同集·族谱》中，对他的家世进行了详细的追忆，他的曾祖和祖父辈都曾隶属军籍，几代都有人从军，曾祖父还战死在沙场，但是先祖几代

都是以农业和商业为生，在他父亲李正考中举人之前，李家并没有出过读书人。大约在他四岁的时候，梦阳的父亲李正被任命为阜平县学训导，小梦阳跟随父母到了地居河北的阜平，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读书光阴。在他九岁的时候，他的祖母病逝，全家奔丧回到了庆阳。两年后，守丧基本结束，李正得到新的委派，要去大梁（今河南开封）封丘温和王府担任教授，李氏全家又一次告别家乡。从此以后，地处中原的开封便与李梦阳的生命有了更多的关联。

李梦阳天资聪颖、勤学善悟，在少年读书的时候，除了得到他父亲的指点外，河南的名士李源也教过他六艺之学。弘治四年（1491年），李梦阳回到庆阳，当时担任陕西督学的大学士杨一清见到李梦阳后，“见而异其才”（朱安澜《李空同先生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对李梦阳很赏识。杨一清（1454—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石淙，云南人，寄籍镇江，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李梦阳也敬服杨一清，自谓“虽不敢自谓得其门而入，亦不敢苟焉以自弃”（李梦阳《邃庵辞》）。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岁的李梦阳在陕西乡试中一举夺魁，声名甚至播及到了京师，以致当时的宰辅李东阳（1447—1516年）对这个青年才俊也倍加留意。弘治六年（1493年），李梦阳不负众人的厚望，考中进士，当时他才二十一岁，弘治十一年（1498年）被朝廷授予户部主事的官职，后迁户部郎中，正德初年升任户部员外郎。

李梦阳二十出头就高中进士，是令很多古代士子羡慕不已的事情，但是对李梦阳来说，这却是他波涛动荡的政治生涯的起点。他出生时，明代建国已逾百年，国家在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表面，统治的弊端也在暗中积生，人们的思想在程朱理学的禁锢下日益保守。李梦阳生活的孝宗（1488—1505年）、武宗（1506—1521年）、世宗（1522—1566年）三朝，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李梦阳初登朝阁，就表现出不畏权

贵、反对势要、遇事敢说敢为的作风，和当时的明朝官场格格不入，以致他在二十年的仕宦生涯中，竟先后五次入狱。

弘治十四年（1501年），二十九岁的户部主事李梦阳奉命监税三关，替朝廷监察边境物资的储备情况，在那里他查出了一批权豪和不法商人相互勾结、侵吞盗卖国家资财的事实。在他们的拉拢和贿赂面前，李梦阳维护国家的利益，不为所动，依法而行，被陷害而入诏狱。诏狱是皇帝亲自掌管的监狱，李梦阳在那里“依然就理，指陈利病，辞气不挠，事遂得白，释，复职”（《年表》）。经过朝廷的重新勘断，他被释出狱，官复原职。可是李梦阳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刚直的个性和不屈的人格，时隔一年，他又凭借着自己的一腔忠诚，写下了那篇有名的政论文——《上孝宗皇帝书稿》。文中指摘时弊，义正辞严，以政治家敏锐的眼光，将国家祸乱的根源直指到豪强和外戚的身上，使得为乱者为之惊悚收敛，朝野为之一振，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李梦阳再度入狱，险遭性命之忧。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皇帝年轻，喜好玩乐，宫廷里以刘瑾为首的一帮宦官号称“八虎”，他们投其所好，整天带着皇帝走马斗狗，刘瑾借此干预朝政，气焰熏天。三十四岁的户部郎中李梦阳，又一次以行动和宦者对抗。正当他的上司——户部尚书韩文痛恨刘瑾之流误国，对此忧心忡忡的时候，李梦阳果敢地支持韩文上疏谏言，并且替韩文写了著名的《代劾宦官状疏》一文。不幸的是，由于明武宗的昏聩，宦官的势力不但没有受到抑制，朝廷中刘健、谢迁、韩文等四十八名士大夫反而因此遭到罢黜，并榜为“党人”。李梦阳同样受到牵连，先是被贬谪为山西布政司经历，继而罢官。这一年，李梦阳回到了开封故居，在黄河之墟、魏国的故城遗址上，与兄长孟和一起筑起草堂，“闭门却扫，课子弟，聚生徒，怡然终日，不履城市”（《年表》），过起了闲散悠然的隐居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次年春天，当

刘瑾知道奏疏出自李梦阳之手时，竟矫旨将李梦阳逮入京师，下锦衣卫大牢。他的兄长李孟和与内弟左国玠多方奔走，好友康海等人援手相助，终使梦阳在入狱三个月后得以获释。康海（1475—1540年），字德涵，号对山、涿东渔父，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以诗文名闻海内，名列“前七子”之一。李梦阳经过了这次灾难，又一次回到开封闲居。此时他已在宦海中浮沉了十几年，他感慨自己的几度入狱，以《下吏》一诗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诗曰：“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与青年时初登朝阁的无所阻挡、意气风发相比，此时他的心境已经有了些许苍凉。出狱后他又回到开封度过了两年多的光景，但这次闲居中的李梦阳心情复杂，感怆今昔，便作《述征赋》《哀才公》自抒悲愤。《哀才公》悲悼一位有恩于自己的将军不幸战死在沙场，他为之伤痛不已，“夷门野夫国士流，痛哭天遥夜雷电”。悲情中渗透着对贤愚倒置的社会的一腔愤怨和对国家的忧念。后来又作《杂诗》三十二首，作《省愆赋》，无不寄托着对当时社会疾患重重的深深担忧。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失去了明武宗的信任被诛灭。听到这个消息后，天下百姓拍手称快，甚至分其肉而食，李梦阳也因此盼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春。正德六年（1511年），他被复官，继而任江西提学副使。正德六年春夏之交，李梦阳怀着愉悦的心情奔赴江西。滚滚的湖湘之水，顺载着他和舟船沿江而下，他的情绪也如同春水一般荡漾，在《正德辛未四月十七日，简书始至于时，久旱甘澍随获，漫尔写兴》一诗中，他用“玺书况属临门日，江汉须看放舸时”的诗句形容他的轻松和喜悦，尽管诗中还是兼杂了一点在仕与隐之间徘徊的复杂感情。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江西为官将会是李梦阳政治生涯的终结，他在江西不能顺服于官场的以尊凌卑，与上司江万实及同僚陈金等失

和，又在江西士子中树正气，奖节义，不让江西生员在权贵面前低眉弯腰，要以他的铮铮傲骨，挺立起一代士风。李梦阳在江西的种种作为，使他在官场中树敌太多，又与同僚互相讦奏，朝廷不久就派大理寺卿燕忠前往江西，专门查处李梦阳与江万实等人的争端。燕忠在广信（今江西上饶）设立勘司，李梦阳先是受命待罪南康（今江西星子县），正德九年正月，他受命由南康至广信，等候勘官勘结。一个在官场上不能与时俯仰的人，在广信又一次入狱，而且遭到了燕忠的百般刁难，江西的好多生员为他奔走求情，请求勘官查明真相、维护正义，但都无济于事，反而还遭到了更大的羞辱。多亏梦阳的好友何景明上书大学士杨一清，乞为申解，杨一清了解李梦阳的忠直品性，伸手相援，才使得梦阳又一次度过了危险。何景明（1483—1521年），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今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曾官中书舍人、陕西提学副使等。何景明不但是“前七子”复古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弘治时期信阳作家群的领袖。

正德九年（1514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季节，身心憔悴的李梦阳终于从广信狱里走了出来，回到了南昌。可是仍然待罪在身的他，只能在南昌的玉虚观里静候朝廷的发落。人虽然在闲居，狱中郁积的诸多感慨却是按捺不住的。在同年的四月八日那天，情绪繁杂的李梦阳写了两封信寄给何景明，“仆交游遍四海矣，赤心朋友，惟世恩、德涵与仲默耳”（《与何子书》），感慨交友虽多，但是急难中能对他不离不弃、诚心帮助的，却只是钱世恩、康海、何景明三位朋友。信发出后不久，李梦阳才得以完全自由，那时，他已经决计离开江西，离开两年多来他不停奔走出力，为之办学校、复书院、兴社学、使风教大行的江西大地。那时他想起了妻子左氏，他们还在九江焦急地等候着自己的消息。于是一恢复自由，他就乘船溯流，赶赴九江，一家人团圆后，他作了一篇